

1. 鄭學稼編(2001)。《傳在史中—中國傳統社會傳播史料選輯》。北京：文化藝術。
2. 黃鳴奮(2001)。《說服君主—中國古代的諷諫傳播》。北京：文化藝術。
3. 李國正(2001)。《漢字解析與信息傳播》。北京：文化藝術。

春雨斷橋人不度，小舟撐出柳陰來⁽¹⁾

——寫在《華夏傳播研究叢書》面世之際

黃星民*

近年來，大陸傳播學界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傳播學研究」有了更準確更簡明的新提法，這就是「華夏傳播研究」。「華夏傳播研究」與「傳播學中國化」、「傳播學本土化」有密切的關係，但不完全相同。在大陸，「傳播學中國化」雖然不排斥對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傳播活動與觀念的研究，但更強調傳播學與中國當代的傳播實踐的結合，「華夏傳播研究」則主要研究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傳播活動和傳播觀念。應該說，華夏傳播研究是「傳播學中國化」中的組成部分，當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由於課題艱深，人才匱乏，投入高而回報慢等原因，華夏傳播研究這一領域素稱冷門。雖然有人羣路藍縷，入山得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與傳播學其他研究領域相比，在這個領域長期跋涉的人並不多，其境頗似宋人徐俯的句子「春雨斷橋人不度」。實際上，華夏傳播研究對中國傳播學的建設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對我們當前的社會現實有鮮明的時代意義。而且，它對世界傳播事業的健康發展也有一定的啟迪

* 廈門大學傳播研究所副教授。E-mail: xmhuang@xmu.edu.cn

作用。

華夏傳播研究對中國的傳播學建設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以來，積極地引進、介紹、研究和建設傳播學，當然是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服務。為了能更好為這一事業服務，傳播學就要能符合中國的國情。因此，在中國傳播學的建設中，我們不僅要放眼世界，引進學習西方傳播學，還要立足中華，瞭解掌握中國的傳播歷史與現實問題。我們相信，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一定會出現中華新文化。作為中華新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中國傳播學，必定要發展繁榮起來，並最終形成「傳播學中華學派」。並使這一學派能與傳播學美國學派、傳播學歐洲學派三足鼎立，爭鳴媲美。可以說，建設「傳播學中華學派」，是我國傳播學研究的崇高而又艱巨的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離不開三個基礎工作：即「引進消化西方傳播科學」、「發掘整理華夏傳播學說」、「研究總結中國當代傳播實踐」。也就是說，當我們用西方傳播科學理論和華夏傳播學說精華，來共同解釋、指導和總結今天中國的傳播實踐，並在這過程中成功融鑄三者，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觀點與風格，為大多數中國傳播學者所接受並遵循，受到世界傳播學界的重視與肯定，這時，「傳播學中華學派」也就自然形成。如果三個基本工作缺少其中之一，建設「傳播學中華學派」這個目標就難於實現。華夏傳播研究雖然艱辛，但我們必須堅持下去，它畢竟是建設「傳播學中華學派」必不可少的一環。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更好理解今天的傳播現實，今天畢竟就是過去的沿襲；它還可以使中國的傳播學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越有民族特色就越有世界性，越有利於中國傳播學走向世界。

華夏傳播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還有強烈的時代意義。在人們通常的理解中，華夏傳播研究內容是古老的歷史，屬於遠離現實的偏冷領域。實際上，華夏傳播研究既研究「華夏文化」，又研究「信息傳播」，兩者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熱點問題。眾所周知，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圈崛起，其間雖然有波折，但在目前世界經濟出現了嚴重衰退形勢下，中國的經濟還是一枝獨秀。如果正常發展下去，中華民族

復興的夢想將在不久的將來得以實現。因此，華夏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關係，華夏文化對中華文化圈崛起的意義，也就倍受世人的關注。上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興起了「文化熱」，經久不衰，華夏文化研究成了時代的熱點之一。我們這個時代又是一個傳播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研究信息傳播自然屬性的當代信息科學，早已成了時代的熱點。在上世紀末的「信息論」的熱潮中，「信息」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流利的話語，「信息科學」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熱門的學科。隨著對信息傳播自然屬性研究的深入，人們將關注信息傳播的社會屬性。如果說研究信息傳播現象的自然屬性是信息科學，那麼，研究信息傳播社會屬性則是傳播學。因此，當前傳播學也受到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大眾傳播」、「地球村」等傳播學的話語風行一時，傳播學我們這個時代的又一個熱點。「華夏傳播研究」扣住「華夏文化」與「傳播學」這兩個時代熱點，並尋找二者之間的聯繫，企圖打通這兩個時代熱點。因此，它決非是遠離現實的冷僻領域，而是具有強烈的時代的意義的「雙熱點」。

華夏傳播研究不僅具有學術意義和時代意義，它對世界傳播事業的健康發展還具有一定程度的啓迪作用。今天，人類在傳播技術方面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以致把我們居住的這顆星球變成了一個村落。然而，在這個村落裏，人與人之間將如何相處呢？是運用這強大的傳播技術來互相溝通，和睦相處，把地球村建設得更加美好；還是用它來爾詐吾虞，相互攻訐，最終毀滅人類的文明。人類的傳播技術越是發達，如何使用傳播技術的問題就越發重要。今天，如何使用這高度發達的傳播技術，這個事關人類未來前途的問題，已經赤裸裸擺在我們的面前了。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研究信息運動規律，繼續發展我們的傳播技術；同時，還更應該從社會科學角度來思考信息傳播現象，使人類不僅在擁有高度發達的傳播技術的同時，還能擁有正確使用這種傳播技術的社會基礎條件。所有關心人類前途的傳播學者，都要像施拉姆說的那樣，在這個歷史關頭，好好地總結下我們人類傳播歷史，

尋找世界傳播事業乃至人類前途健康發展的道路。作為中國的傳播學者，我們就要特別關心我們祖先在這部人類傳播史中所做過的奮鬥，所取得的成就，所獲得的經驗，所得到的教訓，為人類的共同繁榮貢獻出一份我們民族的力量與智能。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的華夏祖先，在人類傳播史的農業時期已經取得輝煌的成就。華夏文明在時間上承「傳」了數千年，成為世界上唯一保存下來古代文明，至今仍然有強大生命力。華夏文明還在空間上遠「播」海外，形成了東亞中華文化圈，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獨樹一幟。華夏文明能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中，如此廣袤的空間中流行保存下來，至今生機盎然，這無疑是人類傳播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究其成功原因，是我們華夏祖先不僅「自強不息」，創造出造紙印刷等輝煌的傳播技術，對人類的文明發展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我們的華夏祖先還追求「止於至善」，為使用這些傳播技術提出了「誠」、「信」等傳播道德思想。正是華夏傳播技術與華夏傳播道德的結合，才使我們的祖先在人類傳播史上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回顧歷史，華夏的造紙印刷等傳播技術，奠定了今天人類工業文明的社會基礎。放眼未來，在正在到來的信息社會中，傳播技術越來越發達，人類越是需要越來越發展的傳播道德來與之相適應。我們華夏祖先，已經給我們留下的精深博大的華夏傳播道德思想。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對於今天的傳播道德的建設，無疑有重要的啓迪作用。我們這一代人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華夏傳播道德獲得鳳凰涅槃式的新生。使今天的中華民族的傳播道德，也能與歷史上華夏傳播技術一樣，再次對人類的文明做出貢獻。

正是對華夏傳播上述意義的認識，廈門大學積極開展華夏傳播研究，成為中國大陸華夏傳播主要研究基地。廈門大學的華夏傳播研究是在余也魯與徐佳士兩位港臺傳播學界老前輩熱心提倡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原所長孫旭培研究員、廈門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鄭學檬教授熱情響應支持，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原主任鄭松鋌先生與現任主任陳培愛教授有力推動下開展起來的。1993年，廈門大學建立傳播學研究所，

做為華夏傳播研究基地。廈門大學又先後於 1993 年與 1997 年召開了兩次有關研討會。在兩次會議的基礎上，先後出版了《從零開始》的論文集與《華夏傳播論》專著，並在香港海天基金會的資助下，設立了「五史六論」的研究計劃研究項目，聯合兩岸三地一批多學科的學者，開展了有組織成規模的華夏傳播研究工作。經過了數年的努力，現在終於推出了《華夏傳播研究叢書》首批研究成果，它們是黃鳴奮教授的《說服君主——中國古代的諷諫傳播》、李國正教授的《漢字解析和信息傳播》、鄭學檬教授的《傳在史中——中國傳統社會傳播史料初編》。《華夏傳播研究叢書》其他著作不久也將陸續推出。現在，我們對這三本著來做個簡要的介紹。

黃鳴奮教授的《說服君主——中國古代的諷諫傳播》一書主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獨特的諷諫傳播現象。諷諫對象是言出法隨的君主，使用的卻是舌頭或筆頭，議論內容更是朝政大事。一句應對，可以匡救時弊，平步青雲；也可以禍國殃民，招來殺身橫禍。它集中地體現了人類說服活動中的尖銳矛盾，積累起豐富的經驗與教訓。黃鳴奮教授一書運用他獨創的傳播主體、傳播手段、傳播方式、傳播對象、傳播內容和傳播環境等傳播六要素方法，對世界傳播史上這一極為獨特的說服傳播現象進行了梳理，並從其中提煉出諷諫傳播的六大原則，無疑大大豐富了傳播學的說服理論。

李國正教授的《漢字解析與信息傳播》一書採用獨特的視角對中國古代的占卦、測字等社會現象做了研究，從不科學的社會現象中尋找科學的規律。本書撇開占卦測字封建迷信的一面不談，而用傳播學的觀點來研究占卦測字如何利用漢字拆解等方法來傳遞卦象和漢字所負載的非社會公認，卻往往又是能決定命運的至關重要的信息。通過對這種中國古代社會曾普遍存在，在世界傳播史上又是十分獨特的傳播現象的研究，李國正教授揭示了卦象、漢字與傳播特殊信息之間的若干內在聯繫與規律，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瞭解到傳播的豐富性，加深了我們對我國古代社會傳播活動的理解，填補了華夏傳播研究的一項空白。

鄭學檬教授的《傳在史中——中國傳統社會傳播史料初編》一書歷時數年，翻閱了一百一十多種的中國古代典籍，做了大量的筆記，最後去蕪存菁，分類歸納，匯編而成。全書分爲七章，依次爲傳播的開始、傳播的觀念、傳播的原則、傳播的過程、傳播的環境、傳播的技巧、傳播的形式等。每章選輯的資料多少不一，每條資料都做了簡釋。書後印有附錄與索引，便於使用。本書體現了歷史學家嚴謹學風和對傳播的獨到理解，爲華夏傳播的進一步研究做了基礎性的工作。鄭學檬這本著作與臺灣傳播學學者關紹箕的《中國傳播理論》從不同的學術視角對華夏傳播研究資料進行了選編，堪稱是兩岸華夏傳播研究資料的雙璧。

《華夏傳播研究叢書》這三本首批成果的出版，如同徐俯所說「小舟撐出柳陰來」，給「春雨斷橋人不度」的華夏傳播研究領域，帶來一股清新，一點生氣。然而，「華夏傳播研究」最終目的是彼岸。在彼岸，它要與「西方傳播科學」，「中國傳播實踐」共同融鑄成「傳播學中華學派」。要達到那麼輝煌的彼岸，靠《華夏傳播研究叢書》這類小舟來擺渡過河，當然遠遠不夠。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座橋，一座能通過千軍萬馬的大橋。這座大橋的建設，就需要有志於此，不怕艱險，心懷中華民族復興夢想的海內外學者們來共同努力了。

註釋

- (1) 徐俯原詩：「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蘸水開。春雨斷橋人不度，小舟撐出柳陰來。」見錢鍾書選注（1979）：《宋詩選注》，第12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